

《春秋繁露》的宋本及明代传本

崔富章 崔 涛

《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有：“《春秋繁露》十七卷 汉董仲舒撰 明嘉靖三十三年周采刻本 张元济跋 傅增湘校跋并录黄丕烈题识又录张元济校”^①。四周双栏，九行十七字，黑口，单鱼尾。卷末有张元济、傅增湘手跋。兹录二人《跋》语如下：

张元济《跋》：

去岁商务印书馆景印《元明善本丛书》十种，第七种为《两京遗编》，其中《春秋繁露》仅八卷^②。

沅叔同年以所藏赵维垣足本寄余。检视，则两本行款悉同。余未及考赵氏为何时人，审其版式，当在明正、嘉之际。《两京遗编》卷首有万历十年胡维新序，是必据赵本覆刻；胡序明言《春秋繁露》八卷，岂误认耶！抑以为罕见，即残本亦姑刻之也。赵氏自称出宋本，刻之汴阳，沅叔以黄蕘圃据钱遵王影宋抄本校《大典》本覆校，知是本实出《大典》本上。卷六第十七《俞序篇》，第十八《离合根》篇，《大典》本错简，是本不错。卷十六第七十五《止雨篇》^③，《大典》本阙一百八十字，是本尚存一百四十四字。惟卷十第三十五《深察名号篇》错简，卷十四第六十五《郊语篇》阙十八字，赵本与《大典》本均误，赖钱本是正。其他订补字句，亦殊不少。涵芬楼藏明抄本一部，为海盐胡宪仲故物；半叶十行，行十八字，与钱本相合。余取与

沅叔所校,逐字^④比对,知两本同出一源。虽胡本间有不逮钱本之处,然胜于钱本者实多。因取所校有异同者,粘签于上,以待覆核,稍有出于沅叔所校外者,但亦未能遍也。将以是书寄还沅叔,因识如右。

民国纪元二十有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海盐张元济。(“元济”印)

傅增湘《跋》:

余校此本已近廿十年,顷菊生前辈假阅,取所藏胡氏抄本为覆勘一过,凡笱记六十五条。余遂竭一日之力,尽移写于卷中,并识于此,以志良友之雅惠云。戊寅六月十二日傅增湘记。

从张元济《跋》看,他从傅增湘处借得嘉靖本《春秋繁露》十七卷检视,起因于1937年商务印书馆影印《元明善本丛书》十种,内有万历《两京遗编》本《春秋繁露》仅八卷。1938年张元济致信傅增湘说:“近印两京遗编。其中春秋繁露缺去九卷。当时疏忽。未及细查。蒙纠正甚感。允借藏本补足。可否乞交伯恒妥寄南来。即速补印。”^⑤所谈正是此事。可知,万历《两京遗编》本《春秋繁露》仅八卷,在影印之时张元济并不知晓,此当系傅增湘告知。故张氏云“蒙纠正甚感”,且认为《两京遗编》本“缺去九卷”。其实,万历《两京遗编》中《春秋繁露》本即八卷,胡维新《刻〈两京遗编〉序》明言“春秋繁露八卷”^⑥。这个问题,张元济知道后可能曾告知傅增湘,所以傅增湘在一封书信中回复说:“两京遗编原刊既为八卷,则不补印未始不可。以其误由胡氏也。然微公言,侍固不知。且检汇刻书目亦明著为八卷。可知目录之学之无穷尽也。”^⑦既然胡维新万历《两京遗编》所收《春秋繁露》本即八卷,卷数与嘉靖周采刻本明显不合,张元济题跋谓万历《两京遗编》本“必据赵本覆刻”,就只能是臆断之词了。

张元济从傅增湘处借得嘉靖本后,又取涵芬楼明抄本与傅增湘所校作了“逐字对比”,得出如下结论:①嘉靖周采刻本优于

《大典》本;②涵芬楼明抄本、钱本同出一源,涵芬楼明抄本尚优于钱本。这里涉及到嘉靖本、《大典》本、涵芬楼明抄本、钱遵王影宋抄本四个《春秋繁露》的本子。张元济《跋》语的观点是否正确呢?上文傅增湘的《跋》很短,其中并没有谈他在这几个本子上的观点。但他早在1929年就曾写过一则《跋校本〈春秋繁露〉》,从此《跋》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傅氏对以上几个本子的看法:

《春秋繁露》十七卷,明刊黑口本,半页九行,行十七字,四周双栏。前有庆历七年四月楼郁序。后有嘉定三年楼钥跋,又嘉定辛未胡桀跋,盖桀从攻媿得善本,属其兄重刊于江右漕台者也。明本虽出于江右本,而讹脱百出。黄荊圃假得秦敦夫所藏虞山钱氏述古堂影宋抄本,校勘一过,凡夺文讹字咸依以讎正,盖《大典》本未出以前,此为最胜矣。余篋藏适有明刻,与此底本正同,因从主人假得,竭三日之力临写终卷,所订正殆数千言。余昔年在保古书坊见孔荭谷手校《大典》本及明活字本,亦移录于此明本上。

昨岁从上海涵芬楼假得明影宋写本,因属赵君万里代为校勘于《汉魏丛书》本上。据赵君云,其佳胜与《大典》本同,半页九行,行十八字,与述古堂影宋抄本行款相同。今以此本参之,凡订讹补脱之处,视涵芬楼本多吻合,惟与《大典》本则偶有出入,岂如荊圃所言,或《大典》纂辑时稍加点窜耶!

考卷十三之首明本缺二番,其文为《四时之副》第五十五凡二百六十五字,又《人副天数》第五十六篇首三百九十六字,按之涵芬楼藏明影宋写本及荊圃所校述古堂影宋抄本,皆缺佚如故;惟取《大典》本证之,皆完然具存。余以为历来影本及《大典》本皆同出一源,惟他本多缺卷十三之首二页,《大典》所据乃初印本,独不缺耳。己巳十一月沅叔识于长春室^⑧。

傅增湘所校明黑口本乃明初刻本。《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有《春秋繁露》十七卷云:“明刊本,九行十七字,黑口,四周双栏。

……”。其下傅氏案曰:“此本当是明初所刻,余别有一本,行款正同,乃从此本翻雕,但此本空格处翻本已改为墨钉矣。”^⑨傅氏所藏的翻刻明初黑口本即嘉靖本,《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经部春秋类“春秋繁露十七卷”条载傅增湘“补”对此亦有记录,云:“○明刊本,九行十七字,黑口,四周双栏。○明嘉靖三十三年赵维垣刊本,九行十七字,黑口,四周双栏。即翻前本,前本空格处此本为墨钉。黄丕烈校宋本并跋。又一帙,孔继涵据永乐大典本校。余藏一帙,临黄丕烈、孔继涵校本于上”^⑩。所云皆可相印证。从傅增湘《跋》语看,他校勘比较各本的主要结论可概括如下:①明初黑口本虽出自宋本,但讹脱百出,已失宋本真貌;②从校正明初黑口本讹脱之处看,钱本、涵芬楼本都是比较好的影宋抄本;③在校正明初黑口本上,《大典》本比之影宋抄本虽偶有出入,但它所据之底本乃初印本,抄本缺佚之处,它独不缺;④历来影抄本与《大典》本皆同出一源。下面我们分析傅氏与张元济在诸本优劣问题上的异同。

在涵芬楼明影宋抄本与钱遵王影宋抄本问题上,傅氏的观点和张元济基本一致:二本行款相同,同出一源。傅氏认为涵芬楼明抄本与钱本在校正明初黑口本讹脱上多相吻合,但未说二者孰更优胜;张氏则认为涵芬楼明抄本较钱本更优。然而,在《大典》本的优劣问题上,傅氏与张元济的说法却截然相反。张元济云:“沅叔以黄尧圃据钱遵王影宋抄本校《大典》本覆校,知是本(嘉靖本)实出《大典》本上。”但傅增湘并没有这样的观点。傅氏云:“盖《大典》本未出以前,此(钱本)为最胜矣。”言外之意,《大典》本在他看来实则尚出钱本之上。他虽则同意黄丕烈的说法,认为《大典》本在编纂时可能间有点窜,但他并没有认为《大典》本比钱本差的意思;在校正明初黑口本讹脱上,《大典》本与钱本、涵芬楼本相比仅“偶有出入”而已。且他说以涵芬楼影宋抄本校《汉魏丛书》本,“其佳胜与《大典》本同”^⑪,其说显然也没有《大典》本逊

于涵芬楼本之意。他考《春秋繁露》卷十三,《四时之副》第五十五篇凡二百六十五字,又《人副天数》第五十六篇首三百九十六字,“涵芬楼藏明影宋写本及堯圃所校述古堂影宋抄本,皆缺佚如故”,“惟取《大典》本证之,皆完然具存”,由是,他认为“《大典》所据乃初印本”,故“独不缺”。结合这些校语可知,傅增湘对《大典》本的评介较黄丕烈要高。黄丕烈《跋》说:“余以《永乐大典》本证之(钱本),多与此合,知两本同出一源。唯纂辑时,稍加点窜,不如此抄本,为宋刻真面目。”^⑩而傅氏则从总体上评价,认为《大典》本优于钱本,实为诸本中最胜者。至于嘉靖本,乃翻刻明初黑口本。明初黑口本尚“讹脱百出”,则嘉靖本之逊可知。而张元济乃谓傅氏认为嘉靖本出《大典》本上,其说误甚。

至于张元济《跋》谓:“卷六第十七《俞序篇》,第十八《离合根》篇,《大典》本错简,是本(嘉靖本)不错。卷十六第七十五《止雨篇》,《大典》本阙一百八十字,是本(嘉靖本)尚存一百四十四字。惟卷十第三十五《深察名号篇》错简,卷十四第六十五《郊语篇》阙十八字,赵本(即嘉靖本)与《大典》本均误。”检武英殿排印《春秋繁露》十七卷(辑自《永乐大典》)本,第十七、第十八篇错简,殿本注明原本错简(殿本更正),则《大典》原本此两处当确实存在错简现象。第三十五篇,殿本“今万民之”句下注云:“案他本误以下文‘言无验之说’至‘故谨于正名名非’四百六十字移在此处。”则《大典》本此处未错简。第六十五篇“此言先圣人之故”句下注云:“案他本脱‘文章也’以下十八字。”第七十五篇“祝一人皆斋”句下注云:“案以下他本阙一百八十字”,皆明言“他本”,则《大典》本此两篇原不阙字^⑪。这几处情况,文渊阁四库本《春秋繁露》亦同《大典》本。因此,张元济《跋》所说《大典》本的几个主要错误,除一处外其他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

可见,张元济《跋》之所以对《大典》本作出比明嘉靖本还差的评价,与他对《大典》本的错误认识直接相关。今天,我们对《大

典》本的认识,当以傅增湘所论为依据,而不能继续因循张元济《跋》语之误。《大典》本之优势在今天尚可以在与宋嘉定四年江右计台本的参照中得到更好的认识。

张元济、傅增湘皆未见宋本《春秋繁露》。今检《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宋嘉定四年江右计台刻本《春秋繁露》十七卷^⑭。十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前楼郁《序》,书末附刻《崇文总目》、《中兴馆阁书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六一先生书春秋繁露后》、《新安程大昌泰之秘书省书繁露后》五则,暨楼钥《跋》、胡榘《跋》。此本乃宋代楼钥所校定。楼钥《跋》曰:

《繁露》一书,凡得四本,皆有余高祖正议先生序文。始得写本于里中,亟传而读之,舛误至多,恨无它本可校。已而得京师印本,以为必佳,而相去殊不远。……开禧三^⑮季,今编修胡君仲方集宰萍乡,得罗氏兰堂本^⑯,刊之县庠,考证颇备。凡程公所引三书之言,皆在书中,则知程公所见者未广,遂谓为^⑰小说者,非也。然止于三十七篇,终不合《崇文总目》及欧阳文忠公所藏八十二篇之数。余老矣,犹欲得一善本。闻婺女潘同季叔度景宪多收异书,属其子弟访之,始得此本,果有八十二篇。是萍乡本犹未尽其半也。喜不可言。以校印本,各取所长,悉加改定,义通者两存之。……仲方得此,尤以为前所未见,相与校讎。将寄江右漕台长兄秘阁公刻之,而谓余记其后。嘉定三年中伏日四明楼钥书于攻媿斋。

从楼氏《跋》可知,在楼氏之前,《春秋繁露》尚无定本。他曾寻得的“里中写本”、“京师印本”皆舛误很多;“萍乡本”(罗氏兰堂本)也仅有三十七篇,与《崇文总目》及欧阳修所藏八十二篇之数不合;后复得潘景宪八十二篇本,楼氏乃合萍乡本与潘氏本,各取所长,得后世所谓楼钥校定本,并在嘉定四年刻之于江右计台(即楼钥《跋》所谓“漕台”),为后世《春秋繁露》之定本,称“宋嘉定四年江右计台本”。此本不见明人著录。清初钱谦益《有学

集》卷四十六云：“万历壬寅，余读春秋繁露，苦金陵本讹舛，得锡山安氏活字本，校讎增改数百字，深以为快。今见宋刻本，知为锡山本之祖也。宋本第十二卷阴阳始终篇^⑮，入者损一而出者句下，二行阙五字，二行阙六字。虽纸墨漫漶，行间字迹尚可扞揣。锡山本盖仍之。而近刻遂相沿以为阙文。其第十三卷，四时之数^⑯及人副天数二篇，宋刻阙卷首二纸，亦偶失之耳，非阙文也^⑰。如更得宋本完好者，则尚可为全书。好古者宜广求之。”^⑱今宋嘉定本卷十二《阴阳终始》篇“入者损一而出者”句下二行阙五字，二行阙六字（案：宋嘉定本又一行残四字）；卷十三《四时之副》、《人副天数》两篇，阙卷首两页，情形与钱氏所见宋本相合。钱氏所见宋本或即宋嘉定计台本。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库馆臣上《春秋繁露》奏云：“盖海内藏书之家，不见完本，三四百年于兹矣。今以《永乐大典》所存楼钥本，详为勘订，……神明焕然，顿还旧笈。虽曰习见之书，实则绝无仅有之本也。”^⑲说明他们并未见到宋嘉定本《春秋繁露》，以为宋本久佚不传，故复从《永乐大典》重为辑录，武英殿排印^⑳，称殿本，亦径称《大典》本。乾隆四十年（1775）于敏中等编纂《天禄琳琅书目》，宋嘉定本未见著录。嘉庆二年（1797），彭元瑞等奉敕编《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其中著录“春秋繁露一函六册”，即宋嘉定四年江右计台本；《书目后编》著录了宋嘉定本的篇卷数目及序跋情况，据楼钥《跋》简要说明了其成书过程，并云：“以程大昌之淹博，跋秘书省之书，尚以诸书所引者不见，遂疑其书为说家，则秘书尚非全本。益征此本之足宝”^㉑，讲明了宋嘉定本的重要性。然而《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撰成后，久未付梓，直至光绪十年（1884）方由王先谦合《天禄琳琅书目》一起付刊^㉒。但是，宋嘉定本仍不为常人所知，且王先谦在民国三年（1914）为苏舆《春秋繁露义证》所作序文亦不曾提及宋嘉定本。故校勘大家张元济、傅增湘未见宋嘉定本，亦不足怪。那么，宋嘉定本与《大典》本相较如何呢？

《永乐大典》今不可见,然《大典》本实存于武英殿聚珍本。《大典》本以《永乐大典》所存楼校本与明刻诸本合校而得,纪昀《校〈春秋繁露〉跋》云:“此本(《大典》本)虽根于宋刻,而修《永乐大典》时校讎亦间有讹字,今于异同处,择其义长者存之,仍注明旧本作某,以存其真,然不过十之一也。”^⑤谓《大典》本根于宋本,明刻足资校正《大典》本者不过十之一。而殿本据《大典》本成书,排印时凡更改《大典》本处又皆明确注明“原本作某”以存《大典》本原貌。今殿本注明原本以示更正之处计十五条,其中文字更正十三处(其中十一条《大典》本同宋嘉定本),另《离合根》篇错简一处(宋嘉定本不误),《奉本》篇卷末衍文一处(宋嘉定本同《大典》本,亦衍);另外,卢校本引钱塘所见《大典》本计二十五处,其中十九处与今殿本相同,殿本不须出注;六处不同者,与今宋嘉定本同三处,异三处,殿本未出注^⑥。如此,计钱塘校引在内,殿本更正《大典》处亦仅二十余处而已,可见,殿本基本系《大典》本原貌,今殿本之优势当主要源自《大典》本无疑。今以殿本(《大典》本)校宋嘉定计台本,其互相校正情况如下:

(1) 宋嘉定本可校正殿本者约六十余处,殿本可校正嘉定本者约一百三十余处。两本在文字互校上,互有长短。仅举数例:①殿本《楚庄王》篇“是故于外道而不显,于内讳而不隐,于贤亦然,此其别内外差贤不肖而等尊卑也”句,“讳而不隐”下注云:“案此下他本有‘于尊亦然’四字。”《大典》本无此四字;宋本有此四字,于义为长;②殿本《竹林》篇“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耻者不生大辱,大辱莫甚于去南面之位而束获为虏也”句,中间部分读起来很不通畅,宋本此句作“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耻,有廉耻者不生于大辱,大辱莫甚于去南面之位而束获为虏矣”,对校可知,《大典》本中间一句误脱“有廉耻”、“于”四字;③《精华》篇“其不救陈之患而责陈不离”句,“责”字宋本误作“贵”,《大典》本不误;④《保位权》篇“有所好,然后可得而劝也,故设赏以劝之”

句,宋本前“劝”字误作“动”,《大典》本不误;⑤《大典》本《必仁且智》篇“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句,“则爱而不别”,宋本作“则爱人而知利也”,其义与董义不合,《大典》本胜。

(2)宋嘉定本《四时之副》第五十五全篇、《人副天数》第五十六篇首三百九十六字阙文(他本从宋嘉定本者如明影宋抄本、明正德兰雪堂本等皆缺;嘉靖周采刻本、王道焜本等亦阙),《大典》本不阙。

(3)宋嘉定本《阴阳终始》第四十八篇文字残缺五处(计二十七字),《阴阳义》第四十九残缺三处(计三字),《大典》本不阙。

(4)《俞序》第十七篇、《离合根》第十八篇《大典》本错简(殿本从他本移正),宋嘉定本不错。

(5)宋嘉定本卷终除楼钥《跋》,尚有《崇文总目》、《中兴馆阁书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六一先生书春秋繁露后》、《新安程大昌泰之秘书省书繁露后》“题跋附”五则,及胡榘《跋》。殿本仅有楼钥《跋》。

从以上比较可知,总体而言,《大典》本所据之底本尚优于今所见宋嘉定计台本很多,故虽明人纂辑《永乐大典》间有错讹,《大典》本已逊于所据之本,但它仍保存了所据底本的很多优势。而今所见宋嘉定本用以印刷之板片又已有残损(纪昀校语谓,“原阙三篇,至明人重刻,又脱第五十五篇及五十六篇首三百九十八字,七十五篇中一百七十九字,四十八篇中亦残二十四字,三十五篇中又倒钉一叶,因而误刻”^⑥云云,今宋嘉定本五十五篇、五十六篇首、四十八篇三处已残缺如明刻,则此三处残缺宋板已有之)。所以,今所见宋嘉定本乃有很多不及《大典》本之处。当然,宋嘉定本在校正《大典》本方面的优势亦不容忽视。

由此可见,虽然傅增湘没有见到宋本《春秋繁露》,但他在对校诸本情况下对《大典》本所作的评价至今仍然还是最公允的。至

于傅氏说“历来影本及《大典》本皆同出一源”一条,笔者认为则尚须加以辨析。涵芬楼藏明抄宋本,冒广生曾借出校勘,今称冒广生校并跋本,藏国家图书馆。半叶十行,一行十八字。前有楼郁《序》,后有楼钥《跋》及“题跋附”五则,与宋嘉定本同。今对校他本,其文字与殿本相异者多同宋嘉定本、明正德兰雪堂本(出于嘉定本),第五十五篇、第五十六篇首阙文亦同宋嘉定本(《大典》本不阙),则其出宋嘉定本无疑。傅氏云《大典》本所据乃初印本,诚属确论。然而,从上文宋嘉定本与《大典》本互校情况看,两本文字差异之处甚多,《大典》本所据底本必非宋嘉定本。然则谓两本同出一源,意其皆出宋本则可,若谓其同出一版则非。至于嘉靖周采刻本,讹脱错误最多,而殿本注谓“他本作某”者(多误)甚众,又多与嘉靖本相符。则知,嘉靖本所据之宋本实为与宋嘉定本、《大典》本之底本皆异之“他本”。若单从嘉靖本判断,则此“他本”必远逊于《大典》本与宋嘉定本。

结语

《大典》本《春秋繁露》今存于殿本,殿本是一个很重要的本子,清人刊刻《繁露》多以殿本为根据和参考,流传广泛的卢校本、凌注本均以殿本为底本。然宋嘉定本今仍存,据李致忠先生《宋版书叙录》,此本经历了从明代皇甫冲、朱大韶,到清代季振宜、徐乾学,直到清大内天禄琳琅的递藏过程。天禄琳琅藏书散出后,此本归入北京图书馆。当时缺失第一册(一、二卷),后幸寻得所缺部分,复归完本^②。今宋嘉定四年江右计台本《春秋繁露》,已作为《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第一期书目,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为学界进一步研究《春秋繁露》提供了方便。

《春秋繁露》一书,历来文字讹脱、残缺、错简现象严重,向无善本。然今其版本所存者尚多。宋嘉定本与殿本相较,各有长短,《大典》本总体尚优胜于宋嘉定本,殿本则更胜宋嘉定本。然宋嘉

定本乃宋本仅存者,虽亦有诸多不足,而优于诸本处实多,可校正《大典》本者亦不少。故今读《繁露》须得以殿本、宋嘉定本为根本,并参校他本。

注:

①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113页。《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春秋繁露》十七卷 汉董仲舒撰 明嘉靖三十三年周采刻本 傅增湘校跋并录清黄丕烈跋又录张元济校张元济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90页。

②《涉园序跋集录》本(以下简称“《涉》本”,张元济著,顾廷龙编,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0页)此处不提行。

③“《止雨篇》”,《涉》本作“止两篇”,误。

④《涉》本“字”作“一”。

⑤《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61页。

⑥胡维新《刻〈两京遗编〉序》,见上海涵芬楼影印明万历刻本《两京遗编》。

⑦《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第363页。

⑧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5—36页。

⑨《藏园群书经眼录》(5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8页。

⑩清莫友芝撰,傅增湘订补,傅熹年整理:《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第一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18—119页。

⑪《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第一册,同注⑩,傅增湘订补“明万历程荣刊汉魏丛书本”条云:“余据涵芬楼藏明影写宋刊本校。影宋本佳处多与大典本合。”第119页。《藏园群书题记》中《跋校本〈春秋繁露〉》谓“昨岁从上海涵芬楼假得明影宋写本,因属赵君万里代为校勘于《汉魏丛书》本上。据赵君云,其佳胜与《大典》本同”。

⑫见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三十三年周采刻本《春秋繁露》十七卷,傅增湘过录黄丕烈《跋》。

⑬上海涵芬楼影印武英殿聚珍本《春秋繁露》,见《四部丛刊初编》(一〇),上海书店,1989年据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重印。

⑭《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经部,第113页。著录此本为“《春秋繁露》十七卷,汉董仲舒撰,宋嘉定四年江右计台刻本,五册”,误,实六册。

⑮宋嘉定本“三”字残缺,据武英殿聚珍本补。

⑯宋嘉定本“本”字残缺,据武英殿聚珍本补。

⑰宋嘉定本“为”字残缺,据武英殿聚珍本补。

⑱宋嘉定本作《阴阳终始》,他本同,“始终”当系“终始”之误。

⑲宋嘉定本作《四时之副》,他本同,“数”当系“副”之误。

⑳宋嘉定四年江右计台本,文字残损非一处,又卷末楼钥《跋》中错简一处,系“题跋附”《程大昌秘书省书繁露后》文字。明刻诸本多因沿宋嘉定本阙卷十三首第五十五篇及第五十六篇首文字,钱氏谓宋本此处所阙两页乃偶失之,恐非。

㉑见潘景郑辑清钱谦益《绛云楼题跋》,见《清人书目题跋丛刊十》,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72页。

㉒清永瑆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44页。

㉓清乾隆间以聚珍版排印《四库全书》中善本138种,称《武英殿聚珍版书》,《春秋繁露》乃其中一种,于创行聚珍版之始即首先排印。

㉔清彭元瑞:《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见《清人书目题跋丛刊十》,中华书局,1995年版,卷三,第261—262页。

㉕参考《清人书目题跋丛刊十》影印说明。

㉖㉗见纪昀《校〈春秋繁露〉跋》,引自钟肇鹏等主编《春秋繁露校释》,山东友谊出版社,1994年版,第931页。

㉘参清乾隆年间抱经堂刻本《春秋繁露》。

㉙李致忠:《宋版书叙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4年版,第221页。

作者工作单位:崔富章,浙江大学古籍所

崔涛,海军潜艇学院